

26059

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十八辑



K250.6
806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本辑编辑 寿充一 徐绪篁 范慧兰

**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河北蔚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3年4月第一版·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张: 8¹/₁₆ 字数: 176000
印数: 1—40,500册 定价: 0.92元
统一书号: 11224·115

目 录

邵力子先生致力于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

- 程思远 张丰霄 (1)
- 回忆邵力子先生和我的关系 孙越崎 (8)
- 忆邵力子先生二三事 凌其翰 (16)
- 怀念新闻师尊邵力子 万枚子 (20)
- 附录: 中国人民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 互相监督”方针的体会 邵力子 (27)

- 我所知道的龚饮冰与建业银行 黄肇兴 (32)
- 陈光甫的一生与上海银行 袁熙鉴 (64)
- 我所知道的金城银行 许家骏 (79)
- 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银行 韩宏泰 (90)

- 上海商品检验局的筹设经过与初期工作概述 邹秉文 (111)
- 解放前的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概略 蔡无忌 (121)
- 我在上海商检局搞茶叶工作的回忆 吴觉农 (148)
- 漫忆上海商品检验局 冯和法 (162)
- 农学家邹秉文 恽宝润 (173)
- 我国动植物检疫工作的今昔 张若著 (220)

- 冼冠生与冠生园 程道生 俞少庵 (224)

邵力子先生致力于一九四九年 国共和谈

程思远 张丰霄

邵力子先生和章士钊先生竭力促进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和谈，其经过略如下述。

邵老是国民党的主和派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呼吁和平。并声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一月四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介寿堂招待文化新闻界，谈有关和谈进行事宜。有记者问，对元旦文告有什么意见？邵力子先生指出，元旦文告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等五条件，而语气又含有招降意味，很不妥当。这真是言人之所不敢言。一月五日新华社便发出了《评战犯求和》为题的一篇评论，把蒋介石文告的外衣层层剥开，使它原形毕露。当时监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国共立即停战谋和。

一月十四日，中共广播电台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提出了和谈八条件。十六日，蒋介石邀约邵力子、

张治中、张群、吴铁城和民社党头目张君勱、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到黄埔路官邸晚餐，饭后就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和谈八条件征询意见。孙科说，中共所提八条件，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他们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和谈应在对等地位上进行才行。邵力子说，三大战役结束，人家本来就是战胜者嘛，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张治中看到蒋介石脸色不对，忙转圜说，今天主要是听民青两党的意见，我们党内改天再谈。蒋经国在日记中，把当天的会议说成“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①

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国民党中央会开会，讨论和谈问题。蒋不参加，由孙科主持。会上邵力子、张治中主和，谷正纲、张道藩主战。双方尖锐对立，激烈交锋，无结果而散。张、邵成为国民党主和派，就是从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一月十九日，蒋介石邀孙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吴铁城、陈立夫到黄埔路官邸，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会后作出决定：由行政院决议，政府希望国共双方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会上，蒋介石说，徐州会战已经结束，杜聿明余部三万多人自陈官庄西南方面突围，最后全部被共军消灭，局面发展到此地步，个人引退已无遗憾。并征询下野文告应如何措词，张治中建议由邵力子起草，邵考虑到他谋和的想法未必与蒋一致，卒辞谢。

奔走于宁沪之间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于二十二日就任代总

① 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统职，通电申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个人服务方针，亦夙以人民意志为依归”。

一月二十二日，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锺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之地点进行和平商谈。

一月二十三日，李宗仁请邵力子去上海，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联络，目的在敦促他们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当时李宗仁所以请邵老负此使命，是因为邵老曾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又仆仆风尘于宁沪之间，为延揽“第三方面”人士出力；深信邵老此行，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一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李宗仁专机飞沪，通过邵力子的介绍，分别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会晤。当日下午李飞返南京，留甘介侯协助邵老在上海联系各界人士。五日李宗仁接到报告，已决定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六人北上试探和平。但后来凌、欧、侯三人不愿前往，而甘介侯又被指为“贩卖和平分子”，不能随行。二月八日，李宗仁再到上海，续与各方联系。最后决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北上，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

随同上述四人前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工作者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胄，还有金山以及中航公司电信课长顾乐村与技师雷仲仁等共十九人。

邵、章北行的成就

邵力子和代表团一行于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半乘中央航空

公司专机由上海机场起飞，下午二时一刻到达青岛，因机轮破裂，在青岛住了一夜，十四日下午四时半才抵达北平。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委叶剑英的代表王拓、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到机场欢迎，并招待各代表住六国饭店。

二月十五日，叶剑英主委亲自来访，与邵、颜、章、江作了初步会谈。当晚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并邀董必武、聂荣臻和傅作义、邓宝珊等参加，席上交谈甚欢，气氛热烈。十七日中共举行欢迎晚会，徐冰副市长作了有诚意言和的讲话。十八日再应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几位的宴会，又作深谈，大家感到快慰。

二月二十日，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民主人士的大宴会。到四百多人，邵力子与章、颜、江三老应邀参加。邵老在席上发言，他说：“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愿选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选天津式的和平。”云云。

二十二日邵、颜、章、江四老从北平乘专机飞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与周恩来副主席会谈了两次。会谈主要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结果非常圆满。四老于二十四日下午飞返北平，并带有毛主席给李宗仁的信一封。后据章士钊、邵力子在五月十八日致函李宗仁追述此事时说：“犹记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对于公之是否力能谋和，颇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的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携，双流会合，并于一响，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由此可以知道，

最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李宗仁是否具有谋和的能力，深表怀疑，后经邵力子、章士钊多番解释，然后才终于开始以李宗仁为对手的和谈。如此得来不易，而李宗仁却最后拒绝和谈协议，这使邵、章感到莫大的遗憾。

“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的简况

国民党政府孙科内阁三月八日垮台，以停战谋和主张作号召的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宣告成立。二十四日何内阁第一次政务会议首先议决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二十八日又增刘斐共六人。邵力子坚辞首席代表，改推了张治中，又派卢郁文为秘书长。中共和平谈代表团成员是周恩来（首席代表）、林彪、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六人，齐燕铭是秘书长，定四月一日在北平开始和谈。在和谈期间，李宗仁和毛主席互通了电报谋和。毛主席从四月八日起，分天邀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会谈，周恩来副主席设宴于颐和园。四月十五日正式会议通过《国内和平协议》细则草案八条二十四款，并以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日期。当晚推定黄绍竑代表偕屈武顾问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专机飞南京请示。二十日晚得南京李宗仁、何应钦复电，主要意思是不同意签字，嘱对和平协定草案再作商讨并反对即行渡江。

力辟“和平即投降”的谬论

四月二十日和平协定签字日期届满，解放大军渡江，那时所

谓国民党主战派已如惊马骇鹿，觅路分奔；独李宗仁坐镇南京，左顾右盼，擅为所欲为之势，操千载一时之机。邵力子、章士钊在北平看到这种情况，焦灼万状，急电李宗仁，请李“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这两点李都未能实行。

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回到桂林，意存观望，再定行止，那时国民党劝驾说客络绎不绝，邵、章又飞电劝告：“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但李宗仁轻信蒋介石致何应钦函中所说“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的话，轻率地到广州维持残局去了。事已至此，邵、章在致李宗仁函中不禁慨然言曰：“公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采，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

其时，蒋介石曾有“和平协定就是投降条件”的说法。蒋经国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李宗仁本日向共方要求暂缓签订协定日期。父亲阅毕黄绍竑携回之二十四项要求后，曾在日记中写道：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①

① 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邵、章两人在致李宗仁的信中，亦就此有所论述。他们说：“某等之愚，以为天下公器非可力取。中共今日之成功，固由本身依倚民众，组织坚强，而亦因于国民党反乎民之好恶，馁败无能。三年之间，党府以全胜以至惨败，迄犹秋风卷箨，不至扫地以尽不止。此在中外历史，尚无前例。大势如此，人心可知！真爱国者处此，应掬诚作最后计较，苟能为国多存一分元气，试问尚有何顾忌而不肯为？或曰，和者名耳，其实降也。欲以此提振困兽犹斗之精神，拚作铤而走险之末计。嘻！斯何时也，顾倒行逆施乃尔！”这些话，是专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说的，意在阐明得民者昌，失民者败，古往今来，无不如此，人心所向，无法违逆。邵、章的金玉良言，对今日台湾当局来说，还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值得他们深思。

回忆邵力子先生和我的关系

孙 越 崎

(一)

邵力子先生，浙江绍兴人，是我的同乡，也是我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复旦公学上学时的国文（语文）老师。他是同盟会会员，与于右任先生交谊很深。二人都是复旦公学的董事。当时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但想终身做总统，而且要当皇帝，所以大肆镇压革命人士，邵先生因此不得不长期住在租界。他在复旦公学教书时，宣传革命思想，对学生出国文课的作文题时，常常寓意反对袁世凯，给学生灌输革命的道理。

我在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五四”运动时，我任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积极参加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这是受到邵先生的教育和感召所致。我大学毕业后去“北满”创办穆棱煤矿（现在黑龙江省鸡西矿务局的一个单位）。一九二九年我出国留学，到上海上船去美国，路过南京。那时邵先生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秘书长，总部设在三元巷。我去拜访阔别多年的邵先生，他勉励我学成之后要为苦难的中国多作贡献，为人民造福。一九三二年我回国以后，因“九一八”事变，东北全部沦陷，

我家就从哈尔滨迁到南京。我参加了当时参谋本部所属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工作,这个委员会碰巧就设在三元巷原来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房子。那时邵先生已去西安做了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有时到南京来,我也常去看他。

(二)

一九三三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派我到陕北的延长、延川、延安一带调查油矿资源,准备进行钻探,我就致电邵先生请予多方协助。那时陇海铁路只通车到潼关,邵先生就由西安派人派车到潼关来接我。潼关县县长兼陕西省政府驻潼关办事处处长张丰胃招待我在潼关耽了几天后,再去西安,与我同行的有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张心田。我们到西安后,邵先生又派了陕西省建设厅技正、北京大学矿科毕业的赵国宾陪同前往陕北。我们调查了陕北油矿资源分布情况后回到西安,向邵先生作了汇报,并请他将来在进行探勘时在器材运输方面给予协助,他深表欢迎和赞助。

一九三五年五月刘志丹、高岗率领的红军解放了延长,油矿人员都得到了解放。那时我因应翁文灏之邀事前到了河南焦作担任中福煤矿总工程师,但仍兼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原职,用无线电联系工作,直到延长解放为止。延长解放后,我曾从河南焦作到西安向邵先生报告经过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邵先生辞去陕西省主席,回到南京。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开始,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当时担任焦作中福煤矿总经理。一九三七年

十月我把矿上职员、家属及部分技工和拆迁的机器设备撤退到汉口。资源委员会在湖南湘潭谭家山有一煤矿矿区，正缺少人员和器材。我因此到南京与资委会商议合作，利用中福的机器与资委会合办湘潭煤矿。那时南京已遭日军的空袭，形势很紧张。我立即返回汉口，与邵夫人傅学文同船抵汉，请她住在我家里。不久邵先生也由南京撤退到汉口，就住在我家。当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常来我家找邵先生商谈，在客厅里往往大声吵闹，不欢而散。有一次蒋介石打电话给邵先生，我在旁听到蒋问邵：“你知道现在的刊物有多少是共产党的？”邵回答：“我查查嘛。”蒋大声说：“我知道百分之九十是共产党的，你做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邵仍说：“我查一查嘛。”在这以后大约一个月，邵先生回来对我说，“你得给我道喜”，我问什么喜啊？他说他的辞职批准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武汉战局紧张。事前我已与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谈妥，中福煤矿与四川天府煤矿合办。我们中福煤矿雇一专轮把职员家属送往重庆。我与邵先生夫妇和他的勤务员仍留在汉口，直到十月底我们才一同飞抵重庆。邵先生就住在领事巷康心之家里。后来他和夫人同去苏联担任中国驻苏大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回国以后，大为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种种大好形势。我曾请邵先生到北碚给我主办的四川四个煤矿联合总处职员讲话，介绍苏联的情况。

(四)

邵先生从苏联回来后，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参政会是蒋介石设置的空洞的、形式上的所谓民意机关。抗战胜利后，参

政会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邵夫人傅学文热爱儿童教育，在南京自买地建筑校园，办了一所“力学小学”。他家就住在小学里，生活十分简朴。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我去东北视察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在东北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国民党一定要覆没。有一天我和钱昌照谈心，我说：“你已辞去了资委会委员长职务，现在没有事做，是否可以想法到解放区去？”他说：“我有时也曾这样想过，你的意见值得好好研究。”我于是向他透露了我想投共的心事，并建议同去找邵力子谈谈心。因为我和邵力子相知较深，据我过去了解，他和陈立夫是对立的，对蒋介石也很不满，和共产党人有联系。我想，我们去和邵力子谈谈，不会泄密，绝没有危险。于是我们同到邵力子家，和他商量，并问他有没有可与中共联系的人。他说：“过去有，现在蒋介石防范很严，已隔断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间，钱昌照出国去欧洲。蒋介石于淮海战役失败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台，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发布文告，以停战谋和为号召，并推动组织了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团员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前往与中共当局交换意见。他们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由上海飞北平，先与中共当局叶剑英、董必武、罗荣桓、林彪、聂荣臻等商谈，二十二日又飞往石家庄，承毛主席接见，并与周恩来会谈。并对通邮、通航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代表团于二月二十七日飞返南京。邵先生原拟与颜、章、江三老同去上海，向上海各界汇报。但他到南京后得悉陈仪已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在上海遭汤恩伯的扣留，卫立煌也被蒋介石软禁了，邵先生因此决定留在南京，但也不敢住在自己家里，他就住在于

右任家里。因于老是国民党元老，想蒋介石还不致到于老家里来抓他。当时屈武也住在于老家里。我常去看他们。

一九四九年三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李宗仁原拟请邵力子担任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但当时邵先生曾表示推让说，由张治中当首席代表为好。因此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代表有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为卢郁文。

卢郁文原是资源委员会的参事，他和邵先生的秘书张丰胄都是我的老朋友。张丰胄要我帮忙解决汽车和办公地点的问题。我说你们应去找行政院。张说，行政院乱哄哄的，你对和谈很热心，所以请你帮忙。卢郁文也要我帮助。我就从资委会拨一辆小汽车给邵力子专用，同时请卢郁文、张丰胄等在我家里办公。他们人少事多，卢郁文又要求我派资委会秘书张月超帮他们的忙。后来代表团北上时，卢郁文和张丰胄把张月超也作为和谈代表团秘书处成员，带到北平去了。

在和谈代表团北上以前的一个晚上，邵先生和夫人傅学文来我家，邵先生说：“有一件事，我们二人考虑再三，解决不了，特来请你给我们出个主意。”他继续说，“现在和谈问题，蒋介石在奉化背后操纵，李宗仁失去自主权，看来和谈是不一定有成功希望的，和谈不成，我不会再回南京，这点你是知道的。因此学文一定要同我一起走，但现在外边已有谣言，说我不是去和谈的，而是去出卖国民党的。如果学文同我一起走，谣言将更大，对和谈更不利。不走吧，她一人在南京有危险，弄得进退两难，你看怎么办好？”傅学文接着说：“我一人不敢留在南京，我要一起走。”我说：“邵夫人如果一起走，我想诚如邵先生说的，谣言将更大，对和谈更不利。和谈不成，邵先生当然知道得最早，现在正是换季的时

候，届时打个电报给我说‘要衣服’。我负责代买飞机票，第二天一定送邵夫人去香港转去北平，保证她无危险。”他们二人都同意了。

四月一日和谈代表团北上后，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李宗仁派在北平与中共接触的私人代表刘仲华乘专机从北平来南京，住李宗仁家里。他拿了一大布包的文件信件等对我说，这是邵先生托他交我转交上海各有关的人收。他还说：“我要去武汉见白崇禧，回来接邵夫人去北平。”后来刘仲华离南京北返前一天，邵夫人到我处辞行。我说您上飞机时设法不要给新闻记者看到。她说一定以最迅速的行动走，避免给记者们见到。但在第二天的南京报纸上还是登出了邵夫人傅学文已飞北平的消息。至于邵先生托刘仲华带来的文件信件等，我托资委会煤业总局上海办事处处长祝福康代为分送。事后，他来汇报说，送去的地方都是门禁森严，他怕国民党的密探跟踪他，很担心。过了几天没有事，才算放了心。

不久和谈破裂，解放大军迅速过江。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何应钦、秘书长黄少谷先后打电话要我到何应钦家里，对我说解放军已过江，我们所有的人今天下午一定要坐飞机离南京。因此我于当天下午飞到上海，几天后转广州，五月一日到香港。我在香港写信给在北平的邵先生，邵转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叫我随时可到北平来。我在香港与乔冠华取得联系，到一九四九年六月我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本来可即来北平，但因与香港中共地下党联系过，为了鼓动和组织资委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起义，将在港所存钨、锑、锡等外销矿产品移交人民，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该所起义时，我才带了家眷乘轮北上，经青岛转天津到北京。邵先生特到车站来接我，几天后周总理接见了我。

(五)

我在香港时，劝翁文灏也回来，他认为自己有罪，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他说：“我的问题，非得到毛主席同意，不能解决。但这就太难了。”当时我同意他的话，但说，“只要有回国的决心，我认为有邵力子在北平，可请他帮忙，也不一定没有希望。”并说：“目前你主要做两件事：一、在你思想上必须与台湾的关系一刀两断。二、快把老父老妻从台湾接出来，先住香港，可以自由行动。”他认真考虑我的话后，表示接受。一九四九年七月间他去台湾住了些时候，亲自把老父老妻接到香港，那时进出台湾还是自由的。我就写信给邵力子说明翁文灏也有想回国的意思，请他帮忙。邵回信表示愿意大力帮助，但要翁先写一份悔过书来，以便进言。

翁文灏决定回国，写信要在上海的儿子翁心源来香港接祖父和母亲回上海。翁心源于九月间到香港。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离香港来北京，带了翁文灏的悔过书交邵力子。他看了，认为不够深刻，不便送上去，要我寄回，请其改写。我说：“翁心源接家眷回国，很快就到北京转去上海，等他来后再寄回去吧。”正在这时，忽见到《参考消息》载称，翁文灏从香港飞往巴黎去了。不到一个月，何以忽然变化，我很纳闷。不久翁心源来了，才知道，我走后，台湾方面派人到港请翁回去，他当然不回去。但怕象杨杰一样在港被台湾派人暗杀，因此他临时决定飞巴黎，是避难性质，回国之心不变。不去美国而去法国，原因也在此。

这样邵力子和我与翁心源商量，改变原意，决定把翁的悔过书先送呈周总理，虽然内容不够好，但足以表示他有返回祖国的爱国愿望。悔过书送上后，周总理同意他回来，但须稍等些时